

# 毁之实属无当，尊之不宜太过

## ——浅谈辜鸿铭及其文化思想

李晓彬

辜鸿铭，这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语言天才，这个英译儒经、“中学西传”的“东方文化代言人”，这个平生嫉恨“歧华”、最是反对“崇洋”的可敬老人，这个性情偏激、顽固保守的“封建遗老”，这个偏爱缠足、认为纳妾合理、蓄着一条灰白小辫的“京城一景”，敬之为怪杰也好，骂之为怪物也罢，委实是近代中国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

在同一时代的外国人眼里，他是精通近十门语言、评论东西方文明是非的著名学者，是“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然而在一些中国人眼里，他却成了为缠足、纳妾辩护，逆流而行、顽固保守的“怪物”，成了“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志的独裁者”（林疑今译《辜鸿铭》，原文见于《人间世》1934年12期，转引自黄兴涛《“怪杰”之谜：一个文化现象的阐释》）。而这个精通西学却又极端保守的矛盾人物，其主要著作多是用外文完成，又由于其自身傲睨一切、好辩善骂、偏激古怪，于是乎笼罩在一层离奇怪诞的神秘之纱中，使人们难以窥见其全貌，只留下“古怪”之

名，此其之不幸也。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随着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他的那些外文著作陆续被翻译回来，再加上斯人早已远去，那个内外交困、救亡图存的时代也已远去，使得今人能有机会也有可能来更客观、更平心静气地打量这个历史人物。虽说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其“古怪”的表面，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他的思想，他的价值，也开始慢慢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辜鸿铭。

虽然辜鸿铭本人偏激古怪，极端保守，但仅因此就完全否定其思想，或者把他完全当成一文化守旧者，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极端守旧派的典型代表，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对近代西学、新学深恶痛绝，则实属无当。辜鸿铭的思想有可取之处，其文化活动也有积极的一面。

首先，辜鸿铭并非一个抱残守缺、盲目排外的守旧派，正如他所说：“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辜鸿铭：《东西文明异同论》）美国汉学家艾恺也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指出：辜鸿铭不是一个反对西方文明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或者说，辜鸿铭在介绍中华文明时，并未排

斥西方文明,因此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称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然而即便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也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以说,他是个精通西学却又极端保守的矛盾体。这与其早年的经历和所受教育有直接的关系。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华侨世家,自小便受西洋教育,幼年即随养父出洋留学,旅欧十数载,通晓英、德、法、拉丁、希腊等近十门语言。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卡莱尔将其引入浪漫主义文学殿堂,同时卡莱尔的好友、浪漫主义思想家阿诺德、爱默生等人也对其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浪漫主义思潮对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注重,对近代西方人性异化、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文明中的“机械性”、“功利性”等弊端的反感,深深影响了辜鸿铭的精神成长,并对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影响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其自身的华侨情结、反现代化思潮的影响等等,但正是因为浪漫主义思潮对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注重,让日后的辜鸿铭很快倾心并服膺于中国儒家文明。或者说也可以说,辜鸿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解,打上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烙印。

正是这些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将辜鸿铭与其他守旧腐儒直接区别开来。正如辜鸿铭所说的那样:“由于我青年时代基本上在欧洲度过,因此我刚回国时对中国的了解反不如对欧洲的了解。”(辜鸿铭《什么是民主》)也正因为他是先了解西方文化,而后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与那些虚

骄无知、盲目排外的守旧派相比,辜鸿铭的文化视野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得多,尽管他强调儒家文明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却也认为应将东西方文明最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一味地排斥西方文明。

其次,辜鸿铭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识,以及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判都是有可取之处的,而他勇于为东方传统文明辩护,驳斥东方文明无用论,更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是将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明高度理想化,然后加以“保守”,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东、西方文明的。而且辜鸿铭所指的东、西方文明通常都是有范围限定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特别是孔孟时期的早期儒家文明;西方文明则是特指文艺复兴以后的民主主义文明。在他看来,前者崇尚的是道德力,是一种道德文明;而后者崇尚的是物质力,是一种物质文明。

这对我们理解辜鸿铭的“文明观”很重要。可以说,辜鸿铭的文明观是很独特的,他认为要评价一个文明,“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这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故决定文明优劣的并不在于其

物质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文明的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所以中国文明“即使不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也是一个至为博大的文明”,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它不仅公认一种道德责任感,将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还使人们能够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而西方近代文明在实质上则是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贯穿着实利主义、机械主义和强权主义的精神,这也是造成西方社会金钱至上、利益至上、人性异化的根源。

辜鸿铭的这种观点,不可否认,有偏颇极端之处,但他这种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而且他对把物质水平作为评价一个文明的唯一手段的批判、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无疑都是很有力度的,这使他的这些观点很快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肯定,我们可从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各种译本序言中窥见一斑:如此书的法文译者古戈列莫·费雷罗便称赞“此书有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反思西方近代文明的缺陷;而此书一经翻译成德文,也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因此虽说他的这些观点在国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有较高的国际价值。

也正是基于此,辜鸿铭对当时流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东方文明无用论等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辜鸿铭

《什么是民主》)。在他内心里,对中国儒家文明的信仰是无比坚定的,而且这种信仰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一种理性的认同,这使他坚信尽管中国的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文明是优越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他更是认为,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成熟;就根本而言,东方文明就像已经建成的屋子,基础巩固,是成熟了文明;而西方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型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尚不牢靠的文明”(辜鸿铭《东西文明异同论》)。

虽然由于辜鸿铭性格偏激,好辩善骂,使得他在为传统文化辩护、驳斥东方文化无用论时,其言辞往往有些绝对,而且常常处有一种争辩的姿态,有时甚至有些滑稽,但在西方文化侵略日重、传统文化逐渐流失的年代里,其行为以及其滑稽背后的灼见,都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辜鸿铭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独特的地位,他英译儒经,对“中学西传”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辜鸿铭翻译儒经的缘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便是源于他对儒家文明的理性认同,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对理雅各英译儒经的不满,以及对西方汉学界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水平不高却又自以为是的不满。他曾这样批评过理雅各的译文:“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尽管他的工作尽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是完全严谨认真的,但他却没有克服其极其僵硬和狭隘的头脑之限制。”(辜鸿铭:《英译 论语 序》)

辜鸿铭翻译儒经的目的在于向西方人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纠正西方人因西方汉学家所造成的对中国的“固有成见”,他在《论语》的译序中写道:“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阅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固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使其纠正谬见,而且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中的态度。”而在《中庸》的译序中更是希望有助于欧美人民能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较清晰的道德责任感,“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民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态度,代之以‘道’”。其情殷殷,实在令人感动。

而辜鸿铭翻译儒经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学贯中西。首先他的英文造诣极高,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便是辜鸿铭。林语堂则认为,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西方的鄂方智主教也认为其文章即便以英国人看,也可与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其次,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要远远高过理雅各之流。而其译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所采取的意译法:“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辜鸿铭:《英译 论语 序》)在不失原文精义的同时使西方人更容易理解,因此他的翻译要远远好过理雅各。

当然,辜鸿铭的翻译仍有不少不足之处,但他作为第一个独立用外文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打破了这一领域长期由外国传教士垄断的局面,故无论是其翻译本

身,还是他翻译儒家经典的初衷,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完全摒弃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不可取的,因此辜鸿铭在维护传统文化、纠正文化激进主义、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将其完全毁之,实属无当。但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的思想却偏离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而且其思想还有很多局限性的地方,再加上其性格上的原因,尊之也不宜太过。

首先,辜鸿铭固然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却并非是一个渊博通达、深思明辨的学者。从其主题思想上来看,他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皆有偏颇,均未能深窥底蕴,有很大局限。

能以流畅犀利的外文向西方之人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是辜鸿铭之所长;其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的爱国之情,是辜鸿铭可爱之处。然其言论却多武断偏激,缺乏依据,其思想也不够系统深刻,缺乏严谨。就连辜鸿铭自己也曾说过:“我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学者。不错,我是精通多门外国语言,但仅靠这个是不够不上学者资格的。”(辜鸿铭《什么是民主》)当然,里面多少也有自谦的成分。因此,其观点可爱则可爱矣,言及可信,在许多地方则是要警觉的。

任何一个文明,即便是最优秀的文明,都是有缺陷的,西方近代文明自然也不例外。辜鸿铭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甚巨,对西方社会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因此当他驳斥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时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在于过分注重物质,把物质水平作为评判文明的唯一标准。但他在批判西方近代文明、

为中国传统文明辩护的时候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或者说，他本来就是用一个极端反对另外一个极端”。他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高度理想化，认为儒家文明提倡的道德修养才是评判文明最重要的标准。如此极端地强调精神、道德，忽视物质、经济的作用，对西方社会反思近代文明的弊端，反思过于注重物质文明造成的恶果，或可称之为剂猛药，但对当时之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中国而言，却不能为人接受。即便于今日看来，此种观点也过于偏激，毕竟道德文明只属于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一个健康的文明，必然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重的文明。

此外，辜鸿铭对西学所长者是文学，尽管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他对代表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却了解不够，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积极性也认识不足。而且为达到其为儒家文明辩护的目的，他有意地忽略了儒家文明自身的弊端以及中国社会黑暗的一面，同时贬低西方近代文明积极的一面，而抓住其弊端不放。或者说，他往往是以东方文明之长攻西方文明之短，甚至是将东方文明之长加以高度理想化，而将西方文明的弊端有意放大化。这就造成其许多观点的结论往往是荒谬的，如他指出“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又如他在谈“民主”时，就认为，就实质而言，中国自汉朝到民国一直实行的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理性民主政治”，而西方的政治却属于“非理性民主政治”。甚至还指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

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这些观点，即便让今人看来，也是不敢接受的。

其次，辜鸿铭虽是个真性情之人，也有可爱之处，但他保守偏激、易走极端、好辩善骂的性格，使得他的言论往往有失偏颇。

辜鸿铭的偏激性格，可从他对传统文明的辩护中窥见一斑：当他强调儒家文化的价值时，儒家文化的弊端几乎被他完全忽略，几近成了最完美的文化。而他为纳妾辩护的“壶一杯众”论，为缠足辩解的“女人之美，美在小足”论，以及“随地吐痰是中国人轻物质重精神的体现”、“廷杖并非不道德”等言论，更是让世人大跌眼镜。他又傲睨一切，好与人争辩，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举动，这也往往使他的观点显得简单偏颇，不能让人信服。

尽管身上有诸多的缺陷，但辜鸿铭却着实是个爱国爱传统之人，可惜当日之中国内忧外患，备受歧视，让辜鸿铭也不得不常常以狂放、偏激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以至于发展成为不加选择地迷恋和赞扬中国文化，甚至为一些封建糟粕和陈规陋习进行辩护的地步，确实有些可悲。

但不管怎样，辜鸿铭都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吴宓先生曾在《悼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写道：“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的良药。”细细品来，其思想从多种角度来看，无论是于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是有价值的。但兴奋剂毕竟不是良药，因此，毁之实属无当，尊之不宜太过。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